

抗战时期国统区师范教育述论

邓庆伟

内容提要 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和树立建国基干的需要,对战前的中等师范教育制度进行了调整,并重建了高等师范教育。针对国统区出现的“师荒”和为实施新县制推行国民教育,国民政府发动了推进师范教育运动。战时的师范教育较战前有显著发展,呈现出独特的发展特征,但存在着严重局限性。

关键词 “生荒” “师荒” 国民教育 推进师范教育运动

师范教育,为各级教育之母。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在“抗战建国”的旗号下,对我国的师范教育作过哪些工作,其成效如何,本文拟试作探讨,以明晰其梗概和得失,作为我们今天振兴师范教育的历史参考。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制定了战时的对内对外方针和政策。对师范教育也不例外,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要求“对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1]。嗣后,教育部拟定了实施的具体方案:“小学师资训练应逐渐集中师范学校,简师应逐渐减少。中等学校师资训练应集中于师范学院内,合格之中小学教师应予以保障,提高其待遇,并予以进修机会。”^[2]这就拟定了国统区战时师范教育的基本规划。

按照这个规划,国民政府对战前的中等师范教育制度进行了调整,并重建了高等师范教育。1938年5月,教育部颁布《确定师范教育设施方案》,规定:“小学教员以师范学校及乡村师范学校毕业生为合格……原有各县立简易师范(其年限不足四年者)及各种短期师资训练班应分年结束”;“二十七年度应即划定师范学校区,每区至少设师范学校或乡村师范学校一所”;“现有不合格及不健全之小学教员……予以相当时期之补充训练”^[3]。划分师范学校区,是为了使该区内师范学校数量足敷培养小学师资需要,并使各地师资培养均衡发展。当时四川省分为16区,陕西省分6区,宁夏有4区……^[4]。另外,国统区还设立了国立师范学校,其目的在于“收容沦陷区失业失业青年及各地退至后方之教职员以发挥教育功能,增加抗战力量,使教师学生各得其所”;“储备沦陷区师资及培养后方之优良小学师资”^[5]。高等师范教育自1922年实行新学制后,全国仅存一所高等师范学校——北平师范大学,“高等师范几完全消灭,而中学师资,遂无独立训练之机关”。抗日战争爆发后,鉴于大后方各级各类教育需人孔亟,国民政府乃决定“应参酌从前高等师

范之旧制而急谋设置”^[6]。1938年7月27日颁行《师范学院规程》为实施高等师范教育之准则。师范学院单独设立或于大学中设置;独立或大学师范学院由教育部审查全国各地情形分区设立。国民政府实施的战时师范教育制度是为了缓解抗战军兴,沦陷区人民纷纷内迁,新校亟谋建设、旧校亟谋扩充出现的师资匮乏的矛盾,并使之按各地实际需要均衡发展。

但是,新的师范教育制度并没有根本解决国统区师资短缺的矛盾,教育界一度出现了“师荒”和“生荒”危机。所谓“师荒”,是指中小学教师的严重不足和在职教师弃教转业的现象空前严重。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对于教育报告之决议案》指出“小学师资之缺乏,为目前严重之问题”^[7]，“西北陕、甘、宁、青四省中等学校的教师,曾完成专业训练者仅占百分之二十三,未受高等教育者却占百分之三十九”^[8]。“中小学教师往何处去了……他们被各机关延请以去了……化学教员作技师去了;物理教员作工程人员去了……”^[9]。所谓“生荒”则是指师范院校的生源极度缺乏和不断发生的师范生退学现象。投考师范学校的人数“极不踊跃”,师范学校招生成了严重的问题。“现在则投考生冷落,即使学校降格迁就,也常常取不足额,形成所谓‘生荒’。”^[10]程天放等人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揭示了师范生退学现象:“最近有少数省份,其已入学之师范生,甚至纷纷请求退学。”^[11]

国统区出现如此严重的师资危机的缘由何在呢?除了沿海各省被日军侵占,还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各地小学,大都经费支绌,教师待遇,均极菲薄”^[12]，“中学之师资因待遇过薄,纷纷转就他业”^[13]。而国统区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更加剧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再安贫乐道的人,当基本生活也难以维持之时,弃教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二)师范生待遇偏低,已远无任何优越性可言。正如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各省亟应设法切实改善师范生待遇,由中央筹拨专款酌予补助,以树立建国基础案》所示:“抗战以后,各国立中学学校学生固可享受膳食制服书籍零用等各项待遇,至一般公私立之中等学校亦多设有免费公费学额,战区学生亦可申请贷金。而各省师范生之待遇,不仅未能改善、反以各地生活程度之高涨,益显其低微,使师范生不安状态。”^[14](三)战时的人才短缺和公私机构对人才的罗致,更加剧了师范院校在人才竞争中的困窘。当时,“努力抗建的后方机关,都在那里饥渴般地抢人才”^[15]。“优秀知识分子多为金融经济工程等事业所吸引,至使学校闹‘师荒’”^[16]。而且,“抗战以来,政府各机关以需才孔亟,多举办短期训练,其待遇较师范生为优”^[17],这也是导致“生荒”出现的重要原因。

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决定实施国民教育制度,师资短缺的矛盾空前突出。国民教育制度规定每乡镇设立中心小学、各保设立国民学校,把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教育融合在一起。次年3月公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决定自1940年8月开始至1945年7月止,5年内普及。这就要求师范教育在短期内培养大量国民教育所需师资,“以五年内普设六十万校计,每校平均分配教师三人,总计需教师一百八十八万人,除原有教师七十万人及短期训练师资六十万人外,其他师范学校科应行培养之师资,尚在五十万人左右”^[18]。于是,“自中央决定实施新县制,限期普及国民教育以后,扩充师范学校,培养健全师资,尤为当前急要之图”^[19]。”

面对国统区十分严重的师资危机,各界人士纷纷呼吁提高中小学教师和师范生待遇,以稳定教师队伍、充实和扩展师范教育。陈礼江在《良师救国》一文中要求“政府对于教师的生活要切实的加以保障,切实的予以优待,务使其能安心教学,不为‘柴米油盐’的问题去操心,而致‘见异思迁’,日存‘五日京兆之心’”^[20]。朱启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师范教育的危机与救治》也呼吁:“提高教师待遇,使教师及其家属无饥寒之虑,子女有受教育之力”^[21]。蒋介石在《慰勉小学教师

电》中也不得不承认：“诸君待遇低微，生活艰苦，尤其抗战以来，物价激涨，致益趋于困顿……中正业已手令各省当局，切实筹维，各就当地实情，尽其财力最大可能，统筹酌剂，迅予补救^[22]。”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程天放等11人在五届八中全会上提出了《各省亟应设法切实改善师范生待遇，并由中央筹拨专款酌予补助，以树立建国基础案》，请求给予师范生优异待遇，同时也制定了改善办法，“师范生应一律比照军官学校学生待遇，除由政府供给膳食及免缴一切费用外，所有师范生应用之书籍文具制服被褥鞋袜及零用等费应全部由政府供给”；“务求达到全公费待遇为目的”^[23]。本次全会通过了程案，并决定“于全国作提倡师范教育之运动”。

1941年6月和11月，教育部对各省市通令推进师范教育运动四项原则和九项补充原则。同年12月，教育部综合以前推进师范教育各项办法，又颁行实施原则8条和工作要项18条，被称为抗战以来“第二次师范教育方案”。

推进师范教育的主要原则和措施有：“各省市中等教育今后应尽先致力于师范教育之发展”；“推进师范教育应与国民教育设施密切配合，以达到每年师范毕业生足敷国民教育之需要为最后限度”；“在实施国民教育时期，应督促各师范学校或简易师范学校尽量招收简易师范科特别师范科以应需求”；“推进师范教育应实施师范生完全公费待遇制……”^[24]。此外，还规定，“自三十一年度起应于每年三月二十九日起举行推进师范教育运动周”^[25]。

“推进师范教育运动周”，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力推进师范教育的重要举措。1942年为首届，以后每年从3月29日黄花岗烈士纪念日及4月4日儿童节隆重举行，其目的“欲以革命先烈纪念日开始至儿童节完成，启示师范生之责任，应将革命先烈建造国家大公无我之精神，负责传递至下一代国民，以先烈之鲜血，灌溉民族之幼苗”^[26]。运动周期间，召集师范教育会议，刊发师范教育专号，举行师范生效忠国家献身教育毕业宣誓等等活动。它对于动员更多的人关心和重视师范教育，使师范教育为社会培养大量健全、合格的师资队伍以及使师范教育沿着健康轨道发展等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二

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和树立建国基干的需要，制定了战时的师范教育政策，特别是以推进师范教育运动的为主要目标的“第二次师范教育方案”的施行，使国统区的师范教育并未因抗战而停滞或衰退，而且还有重大发展。

中等师范教育有显著发展，其概况如下：

表 I 1936—1945年全国师范学校校数和学生数统计表

学年度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学校数	814	364	312	339	374	408	455	498	562	770
班级数	2422	1369	1538	1588	1989	2301	2807	3223	3840	5180
学生数	87902	48793	56679	59431	78342	91239	109009	130995	157806	202163

(资料来源:《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930页)

如表所示,1937年中等师范教育因抗战爆发,与1936年相比,无论校数和学生数都骤然减

少一半以上。但从 1938 年起,均呈逐年稳定增长态势,1941 年已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后来由于国民教育五年计划的实施和推进师范教育运动的开展,到 1945 年抗战结束时国统区师范学校已达到 770 所,虽仍不及战前,但学生数已超过 20 万人,远胜于战前的 8 万余人。这在旧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因为战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学生数最多的年份 1933 年也不过 10.084 万^[27]。

高等师范教育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概况如下:

表 I 1938—1945 年全国师范学院数和学生数

学年度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学院数	6	6	7	9	9	10	11	11
学生数	996	1591	2217	3295	5369	6376	7858	9062

(资料来源:《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 919 页)

抗战时期国统区高等师范教育在 1938 年恢复建立后,与中等师范教育相同,学院数和学生数均逐年递增。1938 年 7 月公布《师范学院规程》后,国民政府即以某些大学的教育学院或教育系为基础,利用其师资及设备扩充而成为师范学院。例如中央大学及西北联合大学的师范学院是利用原有教育学院扩充而成的;由大学教育系扩充而成师范学院的则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及浙江大学的师范学院。此外,1938 年还在湖南蓝田新设了国立师范学院,树立了师范学院独立创办的先声。到抗战结束时,设于各地的师范学院已达 11 所,学生数有 9062 人。

抗战期间国统区的师范教育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发展的,它肩负着抗战和建国的双重使命,既处于特殊的历史阶段,又呈现出独特的发展特征。

(一)师范教育较战前更受重视。“良以教育为建国的基本工作,而师范教育又实握着各级教育的枢纽”^[28]。蒋介石本人也强调,“救国济民,尊师为先”^[29]。“今天我们要昌明教育,必先确立师资”^[30]。“在学校教室为国尽瘁,功效之伟大,不下于疆场转战之官兵”^[31]。实施新县制以后,为培养国民教育所需大量师资,师范教育倍受当局重视,也才有了蓬勃发展的可能。

(二)师范教育趋向“独立发展”。抗战以前,中等师范教育除省立、县立或联立师范学校外,更多的师资培训机构则附设于普通中学内。就是抗战时期新设的国立师范学校,最初也仅为国立中学的师范科或师范部。抗战初期创设的师范学院也多由原大学内的教育学院或教育系扩充而成。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对于教育报告之决议案》决定,“此后应就中等教育方面,尽量恢复师范单独设立制度,积极扩充培养适量优良师资,以应推进国民教育之需求”^[32]。1939 年 3 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师范学院应一律单独设立案》,1941 年 12 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又通过了独立设置师范学院的提案,“规定国立师范学院,以单独设置为原则,凡现时附设于各大学之内者,自三十一年度起应逐渐分离”^[33]。自此以后国统区创办的贵阳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和桂林师范学院,都遵循了独立设置原则。抗战时期国统区师资培训机构趋向独立化、专门化,使师范教育最终独立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对师范生加强训育工作。教育部颁发的《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和《实施导师制应注意之各点》,要求从 1938 学年度起,各地师范学校皆须实行导师制。“导师对于学生之思想、行为、学业及身心摄卫,均须体察个性,施以严密之训导,使得正常之发展,以养成健全之人格”^[34]。《师范学院规程》也规定“为施行严格之心身训练采用导师制”。导师制的施行,使师范教育中的训育工作成为国民党党化发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 年 9 月 25 日,“为依据建国之三民主义与理想

之人生标准(人格)教育学生”,教育部特地颁发《训育纲要》,规定“师范学校并应指示教育救国之真义及中外大教育家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以坚定其学生尽瘁教育事业的志愿与乐育为怀的情操”^[35]。而国民政府所指的“理想之人生标准”、“教育救国的真义”乃是蒋介石鼓吹的“四维”、“八德”。他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的训词中明白地讲到:“总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以及党员守则,可订为青年一致信守以外,所有全国各级学校,可以礼义廉耻四字为共通的校训”^[36]。国民党加强对师范生的训育和党化教育,是要借此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思想箝制。

(四)对师范教育实行统制管理。抗战阶段,国民政府“以统制的精神贯于教育之中”^[37]。在师范教育方面尤其如此。主要表现在:第一,统筹设施,分区设置。“各级师范学校师资训练,应由中央主持办理”^[38],小学师资的培养,由各省依照交通、人口、经济、文化和已有学校情形,酌量划分若干师范学校区来进行,而师范学院则是由教育部核定全国各地情形分区设立。这样,分区设置成为抗战期间师范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其目的有二:(1)统筹师资的供需,使师资培训机构的分布趋于合理化;(2)便于辅导地方教育。这有利于教育网络的形成和办学效益的提高。第二,实行计划招生。“区内省县立各种师范学校之数及招收学生数,均应由厅参照逐年所需增补之教员数,通盘筹划”^[39]。“师范学院应与所划区内教育行政机关,通盘考查该区中等师资需要,为有计划之招生”^[40]。计划招生对于确保师范生的生源和保证师资培训的有效性,是有积极意义的。第三,严格师范毕业生的服务管理。“加强师范学生之管理,严密统制其服务,在规定限期内,必须以担任中小学之教师为限,并严禁各级行政机关及公私立职业团体招用服务未满期限之师范毕业生与师范生”^[41]。在一定期限内对师范毕业生的服务进行统制,有利于保持师资队伍的稳定,尽管这一规定有强人所难之处,却不失为保护师范教育的有效办法。

虽然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师范教育较战前有显著发展,但仍存在着诸多突出矛盾。首先,师资缺乏的现象没有根本解决。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教育报告之决议案》认为,“师范教育制度,现已确立,惟数量与实际需要,相差太远”^[42]。其次,师范院校的分布极不平衡。由于受战局等因素的影响,14所国立师范学校有8所校址在四川。11所师范学院中有3所建于四川,其他省份则极为缺乏。再次,师范教育并未完全走上独立发展道路。虽然国民政府一再主张师范教育要独立设置,但为培养国民教育所需的大量师资,仍然在中学附设师资培训机构;至抗战结束,师范学院完全独立者仅有6所,还有5所附设于大学中。抗战时期师范教育的最大失误是片面强调培训师资的数量而造成了师范生素质的下降。为满足推行国民教育运动的需要,各地“尽量招收简易师范科特别师范科”、“指定公立或县立初级中学三年级增设师资训练科目,以训练国民学校代用教员”等等。如此一来,虽然培训了大量师资,其质量却难尽人意。这是战时条件下师范教育畸形发展所致,与抗战初期的师范教育规划也是相悖的。如表1所示,抗战结束时,国统区师范生数和班级数都大大超过战前水平,而正规师范学校数却不及1936年。

注释

[1][2][6][35][38]李桂林主编《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15页、319页、第316页、第337页、第319页。

[3][4][5][24][25][26][36][39][40]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930页、第945—1008页、第940页、第931页、第932页、第929页、第83页、第930页、第912页。

[7][11][13][14][18][19][23][32][33][41][42]中共浙江党史学会编印《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

案汇编》,(三)第 37 页、第 190 页、第 330 页、第 191 页、第 190 页、第 190 页、第 192 页、第 227 页、第 272 页、第 331 页、(四)第 76 页。

[8]《东方杂志》第 39 卷第 18 号,第 34 页。

[9][15]调梅《中小学教师往哪里去了》,《大公报》,1940 年 5 月 22 日。

[10][21]《师范教育运动》,《新华日报》,1943 年 4 月 21 日社论,1943 年 4 月 2 日至 3 日。

[12][22][31]蒋介石《慰勉小学教师电》,《教育文化言论集》,正中书局 1941 年 2 月版,第 232 页、第 233 页、第 231 页。

[16]《东方杂志》第 39 卷第 3 号,第 42 页。

[17][34]廖世承《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师范教育》,《中华教育界》1947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23 页、第 19 页。

[20]《教育与建国》,教育通讯周刊社 1940 年 1 月,第 82 页。

[27]李友芝等编《中国近现代师范教育史资料》(二),第 802 页。

[28]《中国战时教育》,正中书局 1940 年 6 月,第 113 页。

[29][30]《蒋主席教育言论类选》,正中书局 1947 年 5 月,第 122 页、第 123 页。

[37]《新中国日报》,1944 年 12 月 24 日。

(本文作者系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侯德础副教授)

· 书讯 ·

邓小军《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邓小军教授所著《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一书,最近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 30 万字。

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能不能相结合?换言之,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在根本上能不能相结合?这一学术问题自“五四”运动以至于今天,始终未能获得完满解决。作者用 6 年时间研究此一课题,所得出的结论是: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在核心逻辑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可以而且应当合乎逻辑地相结合。

作者认为,只有理据充分地证明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何以不可能或何以可能相结合,才能决定性地解决二者在思想上能否相结合的问题。而要理据充分地证明二者何以不可能或何以可能相结合,则先须求得儒家思想核心逻辑的正确之解,与民主思想核心逻辑的正确之解。而要求得二者思想核心逻辑之正解,则先须对中国儒家思想、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原典与思想史,下一番尽可能系统、透彻的功夫。本书结构,与作者的这一想法一致。全书共分三篇,上篇《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核心逻辑》,含斯多亚学派、格劳秀斯、洛克、卢梭、杰斐逊、康德、当代及小结各一章。中篇《儒家人性思想与政治思想的核心逻辑》,含儒家天道人性思想、政治精神、政治理想、实际政治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进步作用、儒家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所产生的支援作用、儒家思想是孙中山民主思想的一项重要资源及小结各一章。下篇《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是全书的结论部份。全书并有导言、后记各一篇。

本书文本,采取述论形式,即首先充分地援引基本的文献材料,让文献来说话,然后才相应地给出作者判断的形式,而不取夹叙夹议方式,即议论之中夹引文献材料的方式,以期论证、结论信实可靠。

1995 年 8 月第二届唐君毅学术思想国际会议(成都)上,作者以本书结论部份 3 万余言作为论文参加会议并宣读提要,引起与会海内外学者热烈回应。最近,北京《读书》杂志、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对本书出版作了报道。(童依仁)